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黄修明 张力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国大僧
中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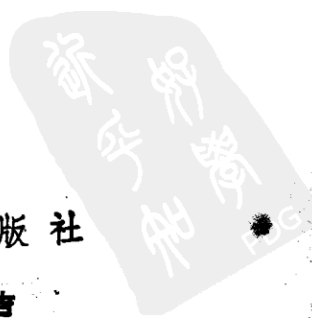
·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

中国十大高僧

黄修明 张 力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1年·延 吉



责任编辑：王 弩 崔厚泽

封面设计：金胜铉

中国十大高僧
黄修明 张 力 著

延 边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延 边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石 岬 造 纸 厂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80千字 印数：1—1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634—0283—7/Z·28

定价：3.80元

·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

主编	舒大刚	吴绍钊	
编委	常金仓	康学伟	梁韦弦
	黄修明	张 力	唐代剑
	蔡东洲	刘伟航	蒋宗许
	江 兰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序

舒大刚、吴绍钊同志主编的一套《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即将由吉林省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接受。我深切感到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我们随口可以说出许多，比如说它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等，这当然是对的，它必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然而我认为，它的意义应当在更深远的层次上考虑。它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别于西方的哲学精神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生动例证。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中国哲学在人生论上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中国的人生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把握个体。所以成为个体的内在规定性，揭示个体的现实性和丰富性。中国哲学人生论讲的个体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具体存在，内里包含着社会的整体。中国哲学不是否定个体，而是对个体的充分肯定。西方哲学的人生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突出超脱社会约束的个人随意性。这样的个体是抽象的，不现实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人生论上的差异不能归结为前者以集体为本位，后者以个体为本位。实际上二者都以个体为本位。问题在于二者论述的个体之内涵不同。中国哲学的人概念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由抽象继续上升到具体，抽象寓于具体之中。人在现实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个体的人总是体现着社会的整体精神。西方哲学的人概念在由具体上升到抽象之后，再未继续上升到具体，因而个体的人处在与社会整体的对立状态中。说得明白

一点，中国哲学提倡爱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人人爱我，从而人们彼此是和谐的。西方哲学宣扬为己，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人人自私，从而人们彼此是对立的。

代表中国哲学主流的是儒家。儒家之外还有道家和佛家等。道与佛与儒家大不相同，但是它们的人生论的基本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利己主义仍然不一样。道家缺乏社会责任心，鼓吹“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是很自私的。但是它指引人们回归自然，泯灭人与物的差别，达到物我相忘，物我为一的境界，其理论归宿恰是个体与社会的合谐，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与西方哲学个体与群体对立的个人主义人生论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佛家，其人生论在追求普救众生和精进奋斗方面与儒家并不牴牾，而在向往出世忘我，遁入空玄方面又与道家几近合流，终于与西方哲学的利己主义最后划清界限。儒道佛尽管差异显然很大，但是一旦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时候，它们的共性便显现出来。它们的境界是高尚的，它们的修养是利人的，它们的追求是人道的。鼓吹个体表面上爱人而内心为自己的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面前不能不黯然失色。所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达了，西方的精神竟一直处在痛苦、矛盾的状态，原因就在这里。近世以来船载以入的洋枪洋炮曾经一再割占中国的土地，而传教士随身带来的西方文化却始终未能征服中国人的心，原因也在这里。

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历史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当然可以相互渗透，但永远不能彼此取代。日本文化曾受过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接着又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然而都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质，日本

文化依旧是日本文化。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优秀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味着西方文化毫不足取。事实上中国文化早已包含着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近年兴起迄今仍在继续的“文化热”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把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甚至看成一切罪恶的渊藪，进而鼓吹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这样的思潮难道能够不令人困惑、忧虑！

读者见到的这套丛书对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好处。它把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精英，通过人物评传的方式如实地成系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人是具体的，生动的，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事业，生活情趣、生平遭遇乃至道德境界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表里一致，身心和谐，行为上表现的，恰是内心追求的，不象西方古典豪杰和近世个人主义英雄那样表面上彬彬有礼，口唱爱的赞歌，骨子里却藏着一把为了一己的利益随时准备置他人于死地的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精华，也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读这套丛书，首先了解这一点是必要的。

吕绍纲

1990年2月

前 言

公元前530年12月8日，在今印度比哈尔省伽耶城南部的
一棵参天的菩提树下，一个盘腿而坐的形容枯槁的青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经过七昼夜的冥思苦想，他终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证得了无上的大觉悟！他宣布：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人所处的世界也是痛苦的，痛苦的原因在于有“生”，生是苦的肇始，生命是受苦的实体；而生是“业”决定的，人由于“造业”而堕入轮回，揆其造业的原因在于“无明”，而无明则产生于“贪”、“爱”。因而，要消灭痛苦，就要断除无明；而要断除无明，就得根除贪、爱。消灭人生的痛苦，是为了达到解脱的目标，进入灭尽了贪欲、无明和烦恼的超越了生死的涅槃境界。

这个获得了觉悟的形容枯槁的青年就是释迦牟尼。从这天起，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宣告诞生。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便发誓要捶响惊世之鼓，震醒沉睡在黑暗中的人们，济渡芸芸众生。从此以后，佛教开始在印度及其相邻地区蔓延流传。五百年后，那些虔诚而热情的信徒又叩响了赤县神州的大门。

据史书记载，佛教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的。东汉初，汉明帝感梦神人，后知是佛，遂遣使去西域求法。到东汉后期，西域僧人络绎东来，他们翻译佛经、阐扬佛法，使佛教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是，终两汉之世，佛教只是被看作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释迦

牟尼同中国的老子一道被高高供奉于贵族神坛，还没有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认识和了解。

魏晋时代是个纷扰不安的时期，频繁战争、残酷的党派倾轧、激烈的权力角逐、动荡的社会生活，把人们抛进了充满漩涡的急流。生命危险、朝不保夕的处境夺去了人们生活的目标，厌世、弃世思想沛然而兴。而两汉大力提倡经学的结果，使经学日益支离繁杂，它的烦琐使人们失去了研讨的兴趣。出于对经学的反动，精神空虚的人们别求一更新颖更高深的学说。于是，厌世主义的老庄思想得以复活，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遂风靡社会。以“诸法性空”的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佛教大乘空宗，因为在思想上与玄学的“本无”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借助玄学而在知识分子中得到迅速传播。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史书所谓“五胡乱华”的时代。西北游牧民族源源不断涌入中原，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政权频替，兵戈不息，战争、饥荒、瘟疫、篡权与内乱连绵不断、大规模的杀戮与毁灭弥漫于史。现实世界充满血污，生命犹如草芥，人生唯有恐惧和痛苦，生活无可眷恋，这大千世界竟变成了茫茫的苦海！为什么人世间会有如此不幸：是难何时了结？希望在哪里？出路在何方？这一切，儒经里翻不到答案，《老》、《庄》也不能解释。于是，释迦牟尼走下贵族的神坛，带着济渡众生的仁慈，带着希望的光芒走向大众。用善恶报应、生死轮回、慈悲戒杀的训导给濒于绝望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同时，由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具有强烈民族偏见的儒家文化不利于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首领在中原称王称

帝，因而他们欢迎外来的佛教，声称：“佛是戒神、正所应奉”，希望借助“佛”（神）的力量稳定他们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结果，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纷纷投入了佛的怀抱。当然，“被压迫者跪倒在佛前，是为了解脱苦难，祈求来生的幸福。统治者匍匐在佛前，是要求人民象他匍匐在神的脚下一样，他要作为神的化身永远统治人间。”

东土乱世为佛教的传播蔓延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使佛教不仅仅作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在下层民众中普遍流行，而是作为超阶级、超民族的信仰受到各阶层人士的顶礼膜拜。

南北朝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它逐渐摆脱了对玄学的依附，开始了独立的发展。一方面，它努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以研究某一佛教经典为中心的佛教学派。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在他们的扶植下，佛教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剥削阶层——僧侣地主阶层。但是，寺院经济的膨胀，也引起了僧、俗地主之间矛盾冲突，并由此导致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大规模的毁佛运动，另外，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为日后佛教的宗派分裂和相互倾轧提供了现实基础。

外来的佛教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逐渐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取营养，获得滋润，茁壮成长。

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佛教的发展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特点

是：学派众多，宗门林立，理论丰富，名僧辈出。佛教宗派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寺院经济的增长，僧侣开始采用严格的嗣法制度以保障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不同理论而产生的不同派别，也是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具有不同偏好的各类信徒的需要。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另外还有三论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等。这些宗派的创建过程，是中国僧人对外来佛教的改造过程，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其中，凡中国化程度越高，其生命力就越强，如禅宗和净土宗；反之，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趋于衰落，如法相宗和三论宗。

进入宋以后，佛教盛极而衰。隋唐时期形成的五花八门的佛教宗派大都呈衰颓之势，只有注重修持的禅、净二宗最为流行。宋代虽然也曾有不少高僧，但他们的影响已远不如隋唐。随着封建皇权的日益加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更加显著，被梁启超讥之为“儒表佛里”的宋代理学就是儒佛合流的结晶。

元朝时期，在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佛教从喇嘛教形式蓬勃发展。元统治者大力扶植喇嘛教，封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帝师”，逐步确立了元朝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使喇嘛教成为国教，凌驾于中原其他教派之上。其流弊所至，造成了喇嘛教的专横恣肆，腐败堕落。十五世纪时，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对藏区喇嘛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创立了喇嘛黄教，流传至今，仍是西藏佛教的主流。

明清之时，由于宋明理学的兴起，佛教思想的精华都被儒教所吸收，因而寺院佛教形式虽具，但其精神已渐式微。

除禅、净两宗继续流行外，其它各宗已徒具虚名、日渐沉寂。但是，佛寺的鲜花虽已凋零，但佛教的鲜花却怒放在山门之外。佛教在明末走出了山门，为众多的在家居士所信奉和研究，这一流及于近现代的居士佛教运动使佛教以一种新的面目继续向纵深发展。

进入近现代后，一因寺院佛教内部的腐化，一因太平天国的冲击，寺院佛教更为衰落，只成为游客凭吊的庙宇和僧徒寄食的场所。但是居士佛教却呈兴起之势。到清末民初，在杨文会居士等人的倡导下，佛教曾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振兴运动。大批佛教典籍被刻印流通、各种类型的僧学堂、佛学院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兴起，数十百种的佛学刊物纷纷问世。这次佛学振兴运动，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而凡有其信仰者，率归依文会。”

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却发展于中国，它在中国流传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经过依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等发展过程，深深渗蓬到中国人的血肉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佛教宣扬仁慈、容忍和退让，慷慨地向濒于绝望的人们赠送美好而虚幻的希望，它与传统的儒教和道教默契配合，共同陶铸了中国人乐观、善良而趋于保守的人格。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蕴藏着高度智慧的佛教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有过极深刻的影响，宋明理学就是在吸收佛教哲学精华基础上形成的新儒学。

“木末芙蓉化，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一首山水诗。火红的木芙蓉在山中怒放，这是何等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任凭花开花落，却无人赞赏，也无人叹息，这又是何等的静谧空寂！这首冷寞得有点不近人情的《辛夷坞》正是诗人的“入禅”之作。在中国历史上，受佛学思想影响的大文学家除王维外，还有陶渊明、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等、等等。佛教不仅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而且还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佛教的变文、宝卷、弹词、鼓词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后来的评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渊源，而唐代的律体诗则是在对梵文音韵的借鉴基础上产生的。

有的学者指出：离开了佛教，中国人说话也不周全。这并非言过其实。梵文的拼音直接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而佛教词汇更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在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诸如世界、实际、觉悟、解脱、方便、烦恼、平等、相对、绝对、知识、唯心、悲观、一针见血、三头六臂、五体投地、皆大欢喜、僧多粥少、唯我独尊、快马加鞭、不可思议、痴人说梦等等、等等，都与佛教有关。

深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王维不但把禅意带进了诗歌，而且还带进了绘画，于是开创了中国画的写意派，至今仍是中国画的主要派别之一。另外，佛教的壁画一直是我国古代壁画的主流，而且对现代绘画有深刻的影响。佛教的雕塑艺术更是佛教奉献给我们民族的一大宝贵遗产。当我们漫游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大同石窟、大足石窟时，谁不为那华美的雕塑艺术所陶醉？此外，佛教的建筑艺术，令美食家们

称羨不已的佛寺斋菜，博大精深的佛教武术，哪一不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不能设想，在中国文化中假如抽掉了佛教文化，还能剩下多少菁华。

总之，中国佛教不但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研究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佛教是由人创造，由人传播，由人发展的。僧人是佛教文化的主体，一部佛教史，就是僧人活动的历史。要了解中国佛教，必须先了解那些献身佛门，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僧人。为此，我们从中国佛教史上众多的杰出人物中，採擷了释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玄奘、法藏、慧能、宗喀巴、袞宏、德清、弘一等等十位僧人作为代表向读者介绍。他们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精英，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在他们中，既有创立僧团、制订僧规的领袖，也有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宗师；既有精于佛理、善思巧辩的硕学，也有学贯三教、德高僧俗的教主；既有不畏险阻、舍身求法的探险者，也有闭关深研、皓首译经的翻译家；既有迹不涉俗、洁身自好的遁隐者，也有趋炎附势、随潮流转的政治僧；既有赤县神州上的护法者，也有雪山高原上的改革家；既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也有目不识丁的禅学奇才。他们虽然生活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但都以自己毕生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从历史角度考察他们的宗教生活，再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展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从而通过他们以了解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足迹，便是本书力图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本书是由黄修明、张力二人合作完成的。具体的分工是：

释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宗喀巴、弘一由黄修明撰写，慧远、慧能、法藏、祿宏、德清由张力撰写。

作者

1989年11月底于四川师院

目 录

前 言	(1)
一代神器释道安	(1)
江东教主慧 远	(28)
西域高僧鸠摩罗什	(52)
千古名僧玄 奘	(72)
禅宗之祖慧 能	(92)
御用和尚法 藏	(127)
黄教始祖宗喀巴	(152)
僧中周孔祿 宏	(178)
政治僧人德 清	(200)
律学高僧弘 一	(226)

一代“神器”

释道安

(公元312—385年)

公元379年2月，襄阳城下，烟尘滚滚，杀声震野，前秦军队在围攻东晋治下的襄阳一再失利后，又一次向这座城池发起猛攻。一队队士兵前仆后继，冒着插石箭雨强登云梯，伤亡者纷纷坠落，城下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秦军终于攻陷襄阳。

军使飞驰长安，向前秦王苻坚禀告秦军已经占领南北军事重镇襄阳城，苻坚表情严肃，不为动容。但当军使汇报说前秦军队在襄阳俘获了东晋玄学名士凿齿和一名佛学高僧时，苻坚神色一变，大喜过望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一的收获就是得一人半耳”。这“一人半”中的“半”人，即指东晋玄学名士习凿齿，而“一人”，则是指那位佛学高僧。他就是弘法襄阳、为苻坚倾慕已久并誉之为一国“神器”的佛教大师释道安。

一、失双亲少年出家 勤学经崭露才华

释道安，俗姓卫，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生于